

## “中国经济学”建设笔谈

裴长洪 胡家勇 蒋永穆 林木西 邱海平 宋冬林  
谢地 颜鹏飞 杨志勇 张晖明 周文

编者按:2022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开启新百年之际,为纪念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先生,厦大经济学科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王亚南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展开深入研讨,本刊以笔谈形式撷取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所刊笔谈文章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DOI: 10.19365/j.issn1000-4181.2022.03.01

### 术语的革命: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裴长洪

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质疑它。中国开放成就巨大,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理论解释。1886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过如此评价:“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2018)那么,总结和阐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也需要“术语的革命”,需要提出这个学科的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理论源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实践成就也需要理论总结,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见解、新理论、新话语。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称之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这就是“术语的革命”在这个学科的内涵。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学科建设,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2012)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世界性的理论。实际上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客观规律;二是分析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社会化再生产过程进行生理学分析。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2009)。因此,在分析不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同时代的国内外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回答不同时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基本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国际贸易问题研究很早就进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发生与生产关系无关,与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和历史进程无关,因此它也是自然和永恒的。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活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范围扩张相联系的。

##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的现实意义

美国指责别国(特别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主要依据就是贸易差额及贸易顺差和逆差。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进行反驳。在世界范围,总出口额大约等于总进口额(忽略到岸、离岸价格),两者收支平衡;因此各国国际收支实质上只是国际分工结构在国际交换中结算货币流向的分配;也是各贸易国对结算货币供求偏好的表现。不存在谁合算,谁吃亏的问题。衡量谁吃亏、谁合算,应当从劳动交换的本质入手。马克思认为国际价值是由世界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际价值规律说明,“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马克思、恩格斯,1974)。但效率高的国家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世界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交换价格上浮空间大,效率低的国家单位产品价值量高,交换价格上浮空间小甚至低于价值量,交易结果前者显然利益大。要求后者货币升值,实际上是人为降低后者单位产品的国内社会平均必要时间,降低后者的单位产品国内价格,使后者无法经营。等价交换与平等交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在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量和创造的国际价值量基本相等,才能实现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的统一。否则,即便按照国际价值规律实行的等价交换,仍然是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富有的国家可以用少量劳动量换取贫穷国家较多的劳动量,落后国家即使得到利润,但总是吃亏。这就是在“自由贸易”掩盖下的国际利益分配规律。

即便在今天,由国际价值规律决定的国际利益分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总体上看,劳动生产率愈高,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愈大,受惠程度就愈高。这就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自由贸易中平等交换的努力方向。中国处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只能按照国际商业规则的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遵从国际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不以垄断价格方式违背国际价值规律的商业道德,与此同时:一方面努力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交换;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帮助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步,使之也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促进它们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平等交换。

## 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理论依据

有一种不说出来,但默认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而且也是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方法,毛泽东说“双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1999)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既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存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属性,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功能的对立统一和两重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

基本理论依据。利用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在提高资本报酬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国际市场中心化和世界货物定价中心化得以形成,使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都达到新水平。

马克思 1848 年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阐述了国际贸易的两重性原理,国际贸易的发展既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对国内国外剥削的扩大和加深,但同时它又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双方都产生经济福利的另一面。马克思还论述了落后国家在进出口国际贸易中利弊具有的现象。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而且还创造了世界性的人类生产文明,例如国际市场交易手段、商业规则与文明的创造与完善,这也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两重性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三、“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观点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态度始终很明确。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1991)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引进了大量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建设了156个重点大型项目。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1999),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与美国以及第二世界中的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引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作出了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扬弃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观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新观点(邓小平,1993),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理论在对外开放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坚持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统一。在明确强调扩大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事情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1993)第二是提出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观点。其内涵是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和经济制度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来划分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市场,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统一的国外市场。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外市场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存在两种制度不同的内部和外部市场,但绝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难以割裂的;它们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各自的力量此消彼长,并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 四、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开放型经济”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的一个专有名称,它没有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它经历了从党的工作理念到理论观点、最后成为内涵丰富的经济范畴的发展过程。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简称

“《决定》”)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sup>①</sup>那时,这个概念是若干工作任务的集合体,后来它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理性概括层次不断升高。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到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历时29年,党关于“开放型经济”的许多反复表述及其主要内容在此期间得到整理,其逻辑架构和理论命题可归结为“六个一”: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一种中国与世界经济平衡的新方式,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价值观。

怎样归纳总结这“六个一”的命题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毛泽东,1999)所以,“六个一”命题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总命题:在国际阶级矛盾不采取对抗(战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如何处理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共中央,2021)。

在两个市场中,国内生产力与国外生产力的同一性多,矛盾性少;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也会走向各自的反面。而国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国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多,同一性少。例如,在实行对外开放后,我们就会遇到中国外贸发展与世界市场空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遇到市场准入、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等问题,就会发生中国的生产力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连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还会遇到国际经贸规则、多双边组织规则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性上层建筑的矛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与旧有的世界上层建筑的矛盾。

总之,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要求保护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也要求保护和世界生产力;不仅要求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求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习近平开放发展新理念中,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世界生产力的实践宣言,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是中国要求完善世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设性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价值观设计(习近平,2020)。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页,第105页。
- [2] 马克思,2018《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2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3-154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 [6]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35页。
- [7]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7页,第130-131页,第441页。
- [8] 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433页。
- [9] 中共中央,20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0日通过《中央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引自《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9页。

## 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

胡家勇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迄今已有30年了。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必将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同时还会增添一些新的重要的体制要素,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 一、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

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规定,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这两个重要规定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并随改革推进而不断深化发展。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允许产权重组和各类财产融合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先富”发展到“共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除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外,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依然是成立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①</sup>,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并已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党中央随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决议和意见等,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九届六中全会对这一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作了高度总结:“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共中央,2021)。

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改革的出发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如何走出传统经济体制,稳妥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的视角已经转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已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这个国家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现代化从一个重要侧面看就是一曲

---

作者简介: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市场经济的凯歌”(李庆余、周桂银等,1994)。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发育成长。一是形成充分竞争和机会开放的环境,而中产阶级的崛起、健全的法治和现代产权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形成全国统一和广阔的市场,使生产和消费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螺旋式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全美铁路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企业家群体的快速成长。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分析企业家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作用时指出:企业家是美国“在迅速崛起的城市中个人发迹与公众生活的提高、个人创业与公众兴旺发达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建设者”(布尔斯廷,2018)。四是逐步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如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发明和专利权;又如反垄断,进步时代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以及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它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要素,如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政府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这些制度要素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素共同成长,并为其构筑基础结构,使其具有不同的面貌。

新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新要素、新变化,或者一些已有的体制要素(如共同富裕)的分量加重了,这些都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思维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快速向前推进,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组织形式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都会对信息流动、产权形态及组合方式、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的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钱颖一(2022)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使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五对关键关系发生变化,这五对关系是: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权与分权、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法治,从而也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不仅追求高质量物质生活,而且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如尊严、自由选择、公平公正、法治等,这些都会对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二是外部冲击也会对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近几年有两个强烈的外部冲击:其一,关键核心技术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关键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的“断供”不时袭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自主可控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其二,新冠肺炎疫情世纪大流行,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深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命健康和经济健康发展。这两大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会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

为适应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容纳和激发新发展要素,能够平衡重要关系。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阶段两个具有革命性的发展要素,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迈向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驱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够充分激发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智慧,能够激励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够引导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这就需要在知识产权的创造、扩散、运用和收益,以及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为创新和绿色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新发展阶段需要平衡两大关系,即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与仅仅考虑发展与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相比,统筹发展与安全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新发展阶段,发展仍然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但同时要加重安全的分量,保障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可控。同样,与仅仅考虑“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某一方面相比,平衡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做大蛋糕”始终是“分好蛋糕”的基础,如果“蛋糕”不能做大,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就会滑向共同贫困。但“做大蛋糕”并不能自动保证“分好蛋糕”,还需要强化一些体制变量来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平衡这两大关系,最重要的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又回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上来。

## 二、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线索

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环境、面临的挑战等都有很大的不同,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可以沿以下三条基本线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基础。

根据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我们已经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来谋划新发展阶段的改革。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一是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的快速成长,使我国尽快迈上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种形态资本的长处,形成相互支撑和补充的所有制结构;统一大市场,开放机会和公平竞争,保证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处于动态优化配置状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化解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和选择自由;等等。这些要素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要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它们进一步发育成长。

再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习近平,2021)具体说,新发展阶段的改革要巩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科学确立和更好体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使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

总之,新发展阶段的改革,要把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快速成长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党的领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第二,适应数字经济新形势,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命题在新发展阶段仍然是成立的。不过,从长时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类似钟摆的运动(De Grauwe,2017)。因此,要依据环境条件变化和应对挑战的需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动态调整。

需要明确的是,新发展阶段,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空间都拓展了。一方面,市场的作用空间扩大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需要开拓新增长空间、寻找新需求、激励科技和组织创新。而市场由于在处理复杂信息和容纳多样性方面的相对优势,可以比较灵活和有效地适应这些新变化。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空间也在扩大,这是因为大国竞争、科技自立自强、生态和环境保护、经济安全、共同富裕等因素的分量明显加重,这些都需要政府力量介入,以有效解决这些具有政治性、全局性、外部性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总体发展、社会整体福利和市场经济运行奠定稳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摆脱政府与市场作用此消彼长的思维定势,建立起二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第三,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科学驾驭资本。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sup>①</sup>,这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必将对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这一本性内在地驱使资本成为一个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矛盾体。一方面,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的作用”(马克思,2009),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

<sup>①</su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第1版。

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2009);另一方面,资本又导致集中和垄断、劳资矛盾、金融膨胀、贫富差距,成为现代社会弊病的一个重要根源。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资本的活力,充分发挥它在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动员和配置生产要素、激励技术和组织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又要有效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科学驾驭资本,包括构建充分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用法治的力量规范资本的行为,等等。可见,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又科学驾驭“资本”,是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条重要线索。

####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布尔斯廷,2018《美国人:建国的历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3页。
- [2] 李庆余、周桂银等,1994《美国现代化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4页。
- [3] 马克思,2009《〈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0—91页。
- [4] 钱颖一,2022《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五个关键关系》,《比较》第118辑。
- [5] 习近平,2021《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页。
- [6] 中共中央,20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8页。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页,第459页。
- [8] De Grauwe, P., 2017.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1.

##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蒋永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sup>①</sup>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探索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现代化百年探索中,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逐步形成。

### 一、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他们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共产党宣言》《法德农民问题》等经典著作中对农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农民问题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因深受资产阶级剥削而具有革命性,因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而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应形成工农联盟,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自身解放,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这对于形成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夺取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sup>①</sup>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电。[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农民问题思想为指导,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推进农村现代化,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199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让农民无偿分得大量土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蒋永穆、王运钊,2019),并进一步引导农民互助合作以实现增产增收,还为解决小农经济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2006年我们党全面彻底地取消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sup>①</sup>我们党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采取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扶贫举措来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改善了农民生活。

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明确地回答了农村现代化“为了谁”“依靠谁”“谁检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满足农民生活需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2021年的18931元<sup>②</sup>,为实现农村现代化创造了重要条件。新发展阶段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就要进一步解决农民烦心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等;制定更多惠农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等。

## 二、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彰显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普遍穷困潦倒、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行了深恶痛绝的批判,并揭露了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历史使命,并对未来实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包含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为实现包含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了艰辛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意识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而进行了多次土地革命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新富农的出现、贫农仍然贫困的现象提出了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以此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邓小平,1993)。为此,他提出了“先富-后富-共富”的思想来指导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为促进农民富裕提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举措(江泽民,2001)。胡锦涛同志则强调国家政策要在越变越好中让农民富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习近平,2016)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精准脱贫举措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民

① 《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人民日报》2020年6月11日第1版。

② 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统计公报。

农村共同富裕创造了重要条件。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推进农村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蒋永穆、何媛,2022),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先后采取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模式助力脱贫工作,最终于2020年底如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2021)的目标,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深厚基础。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就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发展乡村产业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技能水平来增加就业机会、健全工资支付制度来维护农民工权益等。

### 三、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卢梭、康德、黑格尔、傅立叶、摩尔根等的文明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工业革命和引发工人运动为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世界实践活动中取得的伟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彼此相连、相互促进,即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贯穿于我们党推进农村现代化探索的百年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发展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农村增设小学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注重通过农村工业来繁荣发展农村经济,也注重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毛泽东,200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提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等措施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农村思想文化建设,并要求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农民科学技术教育(邓小平,1993)。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sup>①</sup>胡锦涛同志强调,农村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要培育“乡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促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既要物质帮扶,也要精神帮扶;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也要“乡风文明”,而“乡风文明”的本质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2016)。

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显著成效。2021年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指出,农村脱贫群众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和升华,脱贫致富热情高涨、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现代观念不断增强、文明新风广泛弘扬。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就要在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中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同时,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培育行动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进一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等。

### 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追求生态宜居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应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针对人类“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情况,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sup>①</sup> 江泽民《江泽民在参加陕西南湖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扎扎实实推进西部大开发》,《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第1版。

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2009b)。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其着力点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坚定不移走保护环境、绿色发展之路;二是更好满足农民期盼有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开始进行森林培养、兴修水利和生态修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连年战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并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毛泽东,200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并指出了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依靠力量,即“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江泽民同志指出要通过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等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江泽民,2006b)。胡锦涛同志指出要通过加大节能环保投入力度等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胡锦涛,2016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将农村美与农民生活质量、美丽中国建设紧密结合,注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要求“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sup>①</sup>

生态宜居是农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显著成效,农村生产方式得到改进、环境质量得到提升。新发展阶段改善农村环境、形成生态宜居,就要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采取深入开展厕所革命、科学处理生活垃圾、推进农村污水治理、进一步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等举措来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 五、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坚持科技引领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身处近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虽然他们并不直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但他们在深入考察近代工业史的基础上高度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中,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劳动和生活方式等作用,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充分发挥科技引领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了科技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农民技术拙劣问题是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科技在提高农业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先后颁布和出台了一系列推广农业技术的政策文件以促进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并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强音(邓小平,1994)。江泽民同志针对科技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工作、从农民中选拔培养科技人才(江泽民,2006a)。胡锦涛同志指出要通过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来促进农村发展(胡锦涛,2016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科技在助力农村发展中成效显著,并希望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sup>②</sup>

①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人民日报》2018年4月24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2日第1版。

坚持科技引领是促进农村发展的动力,让农村现代化得到加速推进。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中坚持科技引领,既是对时代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更是实现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新发展阶段坚持科技引领农村发展,就要运用科学技术研发良种等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并在加大农民科技培训力度中提高农业机械化耕作普及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质量和经济效率变革等。

## 六、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城乡关系由分离到融合的发展规律,即“城乡一体—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是深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而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不能消灭城乡对立,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城乡对立才会消失,并最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马克思、恩格斯,2009a)。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在推进农村现代化中“推动城乡关系从分离走向融合”(蒋永穆、胡筠怡,202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运动的同时,也在思考城乡关系,毛泽东同志提出“城乡兼顾”,将城市与农村联系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采取建立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城市建立国营经济等举措活跃了城乡市场,在农业复苏中带动工业恢复、在工业发展中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改变了城乡对立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为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采取了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等措施,推动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互助、协调、统筹发展阶段,从而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并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了专门的部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城乡融合,而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习近平,2020)。

我们党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者们认为,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与国外形成了鲜明对比,即“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却没有出现贫民窟问题”(贺雪峰,2019)。新发展阶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就要采取加快乡村建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的措施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7-78页。
- [2]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1页。
- [3] 贺雪峰,2019《城乡融合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人民日报》11月1日第9版。
- [4] 胡锦涛,2016a《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4页。
- [5] 胡锦涛,2016b《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7页。
- [6] 蒋永穆、何媛,2022《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人文杂志》第1期。
- [7] 蒋永穆、胡筠怡,2022《从分离到融合:中国共产党百年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 [8] 蒋永穆、王运钊,2019《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及未来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
- [9] 江泽民,2006a《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1-436页。
- [10] 江泽民,2006b《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6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7页。
- [12] 马克思、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9页、第559-560页。
- [13] 毛泽东,1993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页。
- [14] 毛泽东 2009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5页、第509页。
- [15] 习近平 2016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祝全国各族人民健康快乐吉祥祝改革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人民日报》2月4日。
- [16] 习近平 20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页。
- [17] 习近平 2021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6日第二版。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1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9页。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页、第523页。

##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发展战略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林木西

### 一、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全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影响

王亚南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厦门大学原校长。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是我国经济学教育研究重镇,在王亚南先生及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以来,我们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以及两校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使线下会议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两校通过线上会议等多种形式,始终热线不断、热情不减。

我与厦门大学的缘起最早是在1978年。当时在辽宁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教我们《资本论》的老师,就是王亚南先生的研究生、后来担任我们经济系主任的李廷才教授。那时大家对他都很钦佩,因为他是王亚南先生的弟子。本科4年除了系统学习《资本论》三卷,我还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1861—1863年手稿)。

我与厦门大学正式结缘,是1983年2月23日至3月3日在厦门大学参加“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即“无锡会议”)。当时我的身份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资本论》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导师刘波教授,同时担任宋则行教授的学术秘书。我是以论文入选的,提交的论文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商品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这是我的毕业论文,1982年曾获辽宁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983年在《学习与探索》第2期正式刊发(全文1.25万字),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厦门会议是继无锡会议之后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会,会议选择在厦门大学召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王亚南先生在《资本论》翻译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厦门是全国经济特区之一。全国一批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如许涤新、漆琪生、骆耕漠、陶大镛、关梦觉、宋涛教授等悉数出席开幕式,许涤新致开幕词并做“生态经济学”的报告。仇启华、胡代光、朱绍文、关梦觉教授先后就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转型问题与《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两个问题做了大会发言。陈征教授做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发言,何炼成教授与卫兴华教授就生产劳动问题展开讨论,厦门大学蒋绍进教授就劳动力所

作者简介:林木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有制做大会发言,香港《世界经济导报》主编、厦门大学副教授陈可琨对“当前香港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了介绍。会议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取得了一批关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研究等的重要研究成果。厦门大学对此做了大量工作,也使与会代表对新设立的厦门经济特区有了感性认识和了解。

对于像我这样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入门者来说,除了得以近距离地领略大师们的风采、享受丰盛的经济学家大餐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2月28日晚,会议组织者(联系人厦门大学李绪霭)特意在厦门大学招待所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安排了一次“青年经济工作者座谈会”,邀请陶大镛、关梦觉、仇启华、马家驹、卫兴华、田光等著名经济学家与参会的青年学者进行座谈。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52位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亲耳聆听了各位专家的教诲。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我抢在巫继学、陆立军和程晓莹之后第四个发言。其间老一辈经济学家不时进行插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如宋涛教授说“在座的都是40岁以下的,大有希望。我今年已年届古稀,都70了……如果说你们是早上10点钟的太阳,我就是晚上的太阳了。”陶大镛教授马上纠正道“不是晚上的太阳,是晚上的月亮。”宋涛教授解嘲道“那是夕阳嘛!”(众笑)由于讨论热烈,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钟方才结束。

厦门会议不仅讨论学术问题、鼓励新人脱颖而出,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学术组织的发展。在分组会上专门有一项内容是讨论成立研究会。这次会议后,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全国财经类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会(之后还有全国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以及省级《资本论》研究会纷纷成立,这对于促进《资本论》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办理的加入“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登记手续,记得当时还交了1元会费(规定100元工资以下者交会费1元,100元以上者交5元,200元以上者交10元)。还当场发了一个红色封皮的会员证。8天的厦门会议在我的一生中意义重大,使我对厦门、厦门大学、陈嘉庚、王亚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厦门大学美丽校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之后每次到厦门大学参加会议都感受到有一些新的变化。

我对厦门大学进一步的了解缘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编写。当时全国有4部影响较大的教材:一部是根据于光远的倡议,由教育部政教司组织、全国20所高校的马列教研室和政教系教师集体编写的全国理工农医等非经济学科政治课代用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简称“北京本”),1979年9月先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2期发表,同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朝尊,1980)。<sup>①</sup>还有两部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是由南方16所大学编写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南方本”),由复旦大学蒋家俊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担任主编,四川大学石柱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伯庚教授任副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第一版,至1994年共修订出版6版<sup>②</sup>。二是由北方13所高校编写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北方本”),由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主编,辽宁大学章宗炎教授、南开大学朱光华教授任副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第一版,至2013年共出版10版。<sup>③</sup>与此相配套,“南方本”和“北方本”还组织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两部教材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在全国文科、经济学科影响甚大,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大奖,培养

① 参加本书第二、第三稿编写并最后修改定稿的有(按姓氏笔划为序):方生、王永治、朱述先、张朝尊、陈德华、李成勋、邱沛玲、胡乃武。

② “南方本”1979年9月第一版、1982年6月第二版、1983年5月第三版、1985年7月第四版、1987年2月第五版,1994年改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第六版。

③ “北方本”1979年12月第一版、1982年10月第二版、1985年6月第三版、1988年10月第四版、1992年12月第五版、1995年8月第六版、1998年第七版、2003年1月第八版、2009年8月第九版(参编单位扩大至全国39所高校)、2013年8月第十版。

了全国几代经济学子。吴树青教授、卫兴华教授曾专门撰文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吴树青、卫兴华, 1981)。还有一部是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主编的全国理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系科政治理论课使用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全书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第一版,至2005年共修订出版13版,在全国影响也非常大,并创造了两千万册的发行“天量”(林木西, 2018)。

本人有幸,1988年至2013年一直参加“北方本”的修订编写,历时25年,同时担任辽宁大学方面的学术秘书(南开大学的学术秘书最早是常修泽教授,后来是周冰、柳欣教授)。谷书堂、宋则行两位老先生对我关爱有加,2003年第八版提携我任副主编(当时的三位副主编为朱光华教授、何炼成教授和我),使我诚惶诚恐,感觉是“小鱼串在大串上”。2009年第九版实现主编的新老交替,由我和柳欣教授接任主编,2013年出版第十版。对两位大师的教诲我始终铭刻在心,常怀感恩之情。同时,我觉得对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好的纪念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把他们的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像厦门大学有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辽宁大学有“则行班”,我想我们各个学校特别是“基地”院校都应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来传承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宝贵遗产。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设立以这些老先生命名的全国性奖项。

厦门大学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下,共同创办了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85年,北京大学(主要代表性人物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卫兴华教授)、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谷书堂教授)、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曾启贤教授)、吉林大学(关梦觉教授、张维达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等8所原国家教委直属大学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经过37年的发展,该研讨会业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理论经济学三大会之一。时至今日,会议的11位发起人唯一健在的是吴宣恭教授,他每次在庄宗明教授的陪伴下与会指导并神采奕奕地登台发言,成为会议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说到厦门大学101周年校庆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发展,我认为还有位值得一提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他所创立的学科,这就是钱伯海教授和国民经济学学科。厦门大学的统计学科历来在全国久负盛名。1950年,王亚南先生创建了厦门大学财经学院统计学系。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更名为计划统计专业。1982年将计划统计专业升格为计划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系,钱伯海出任系主任。虽然他是研究统计学的,却一直对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几乎每次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都积极参加。1986年、1987年在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上、下),由此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1998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文科专业进行调整,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项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在钱先生那里,国民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统计学相通的,刘国光教授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国民经济学当下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有了许多不同之处,但从理论根源上说,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曾交替使用“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如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把国民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马克思, 1979a)。在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甚至把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并用,称之为“国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 1979b)。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民经济学是对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反思,实现了从“国民经济管理学”向“国民经济学”的转化。从现实逻辑来看,它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还可以从中国国民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浅析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习近平,2017)他还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按照新要求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sup>①</sup>之所以一再强调战略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我的理解是因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也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国家战略)是执政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治理理念和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二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为统揽全局指引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宏伟蓝图,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经纶大计,是最主要的国策,作为一位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位战略家,经济学家更应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三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面对世情、国情、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变化。必须准确把握战略方针,明确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对策,在重大战略方面不允许有半点迟疑和误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新时代,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这里所说的“问题”既包括世情又包括国情。“世情”就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俄乌冲突下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为此要进一步研究新的“战略机遇期”,分清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国情”就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应对新局面新问题新挑战,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此,要有“答卷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历史是判卷人”在第二个百年的赶考路上我们要争取答出好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主要应从“牵动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实现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具体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两个方面,中国正是把握住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其中,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四化同步”“五化协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2014)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与此同时,对“四化同步”“五化协同”做出一系列的具体安排。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2018)<sup>②</sup>,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是共产党人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强国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两步走”的“四个现代化”战略,“三步走”“新三步走”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础

① 新华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7年7月26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7/content\\_5213859.htm](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7/content_5213859.htm)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28页。

上,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新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提出“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从“小康社会”到“社会主义强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更加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进步的现代化。

与其相适应,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强国战略。一是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创新驱动战略;二是党的十九大总结和提出了“建设”“加快建设”“实施”14个社会主义“强国”“中国”战略;三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总结和提出“加强建设”14个社会主义“强国”战略;四是在其他场合提出的“强国”战略。这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遂使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具体化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逐一实现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推动“新两步走”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2013《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页。
- [2] 林木西,2018《跨界耕耘、通俗传播——“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蒋学模》,《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
- [4] 马克思,1979a《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页。
- [3] 马克思,1979b《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页。
- [5] 吴树青、卫兴华,1981《试评三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6] 习近平,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21页。
- [7] 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0页。
- [8] 习近平,2018《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2月19日第2版。
- [9] 张朝尊,1980《谈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编写》,《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邱海平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共中央,2021)《决议》的这个论断说明,高质量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必须从高质量发展这样

---

作者简介: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个新的发展思想出发理解许多问题,包括共同富裕问题。

提出“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一个命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人们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都是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立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等角度来理解的。在这些理解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更应该把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不仅要把实现共同富裕理解为发展的结果,更应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进一步深刻理解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了,同时全体居民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状况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是必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客观背景。但是,对于共同富裕问题,社会上的不同群体的感觉和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许多人把共同富裕仅仅理解为一个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所以社会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以至于中央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不是搞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共同愿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受老百姓欢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何使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够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所理解和拥护,能够使这部分人自觉地参与到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来,也是十分重要的。

出于这些考虑,本文围绕“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个命题,谈三点看法:

第一,要理解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理论作为出发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往往都会讲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内容。在那里,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生产四个环节的形而上学理解出发,阐明了这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突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几个范畴完全割裂开来的理解上的局限性,拓展了这几个范畴的含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09a)其中与共同富裕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核心理论命题是,生产与分配是内在地一致的,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即同一个关系的另外一面。撇开后来出现的所谓二次、三次分配不说,仅就所谓初次分配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是,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不能讲生产关系时不讲分配关系,或者先讲生产关系然后再讲分配关系,如果是这样,就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路和做法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和逻辑中得到证实。这里只强调两点:一是在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分析了工人所得的工资在实质上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因此,马克思把资本家与工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统一在一起讲的。马克思的分析告诉我们,所谓劳资之间的生产关系,除了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之外,就是生产过程中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如何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2009b)。二是恩格斯说过,剩余价值分配像一根红线贯穿于《资本论》第三卷,而《资本论》第三卷的标题并不是“剩余价值分配”,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1965),这就是说,马克思仍然是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剩余价值在各种资本形式以及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分配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说,第一、二卷的研究都是以产业资本作为资本的代表形式来展开的,而把其他资本形式和土地所有权抽象掉了,从而把产业资本家理解为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这仅仅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命题,而不是客观事实本身,因为第三卷的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资本以及土地所有权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它们分别占有一定形式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同时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c)从现实生活的实际来看,从来没有制造业企业获得利润之后再给商业企业或银行分配一部分利润或利息的事。总之,《资本论》第三卷对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理解同第一卷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正确理解共同富裕问题就必须在理论

上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而不能不知不觉地又滑到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解上去。具体来说,就是要从生产出发理解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以及共同富裕问题,也就是要把共同富裕内生为生产的问题,而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一个脱离了生产的单纯的分配问题。

第二,既然共同富裕问题必须从生产出发来理解,而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在理论逻辑上就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从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的特征来说,就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进而把推动共同富裕理解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在理论上,就需要讲清楚,为什么共同富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是利一方损一方的零和关系。

第三,要说明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必须讲清楚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新时代发展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是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内在要求是什么,然后说明共同富裕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只要系统梳理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和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实践逻辑,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习近平,2020),并且对如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六个方面的部署。随后召开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时间里,党在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系统论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2020)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转变发展方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全面阐述了高质量发展六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其一,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其二,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

其三,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催生新的需求。

其四,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五,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

其六,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

习近平总书记最后概括性地指出“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2020)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可以看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满足人民个性化、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需求,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投资有回报、

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全社会共赢,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完整内涵,从而也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还要注意到,十九大以来,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多方面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例如,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等等。这就表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不限于经济发展,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具有统领地位。

总之,我们需要在理论和思想认识上,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联系及其内在要求出发、从推动共同富裕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含义,把共同富裕问题内生于高质量发展,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出发来探索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再从收入再分配和财产占有的角度出发考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关政策设计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19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12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23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07-244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2009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9-873页。
- [5] 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3页,第237-239页。
- [6] 中共中央,20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人民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理论价值与存在形式

宋冬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进程中的实践凝练,是指引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南。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启了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研究中国经济的新篇章。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基础,在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新的经济范畴,构建了新的研究范式,借鉴并发展了现代分析方法。几十年间,我国各类学术思想、观点呈百家争鸣之势,各种著作、政策文件可谓汗牛充栋,这都标志着我国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作者简介:宋冬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一、问题的提出

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门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完善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推进系统化、学理化、体系化建设,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这一方面,国内学者已经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发表了不少极具价值的观点。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不断摸索、不断发展的阶段,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必定存在困难,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限制。另一方面,我国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课题多是由党政部门主导提出的,而学界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政策文件加以学理阐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学理性、逻辑性、系统性,整个理论体系不能仅仅是政策方针的拼凑和堆砌,或是对文件的注释和解读,也不能随着时代、问题、政策的变化而轻易改变,应是一个相对科学的理论体系既是广大理论工作者深耕于学理层面的有益成果,也将为更多原创性理论的创造提供丰厚的理论土壤。

一门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一定是在一系列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演绎方式所形成的系统化经济学说。正是其中的逻辑演绎方式,即研究逻辑、叙述逻辑、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归宿等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结构。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演绎方式的研究众多,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逻辑起点与逻辑主线的选择。对此,笔者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即能否在众多范畴中找到一个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的确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逻辑与叙述逻辑的展开方式而得出的,并且这个核心范畴也决定着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与逻辑归宿。在得到这一核心范畴后,通过对它进行深入的内涵挖掘来确定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与逻辑归宿,从而确立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当然,这种想法的出现一定是因为头脑中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核心范畴,它的确定既缘于一种长期研究所形成的经济学直觉,也是经过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逻辑检验的理性判断。

那么什么是核心范畴呢?对一种理论而言,核心范畴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理解、运用、发展整个理论体系的钥匙。经济范畴是人脑对感性经济实践与感性认识进行抽丝剥茧的思考后形成的理性认识,是总结概括经济活动本质与规律性的带有思辨色彩的概念。各种经济理论均是围绕一个或几个经济范畴而展开的,而各经济理论之间正是借助于某些共同范畴,通过特定的叙述逻辑构成整个理论体系。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之所以各不相同却又能够相互衔接,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正是因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核心范畴,虽然在核心范畴之外还存在一些重要范畴及其延伸范畴,但只有核心范畴能够决定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形态。总的来讲,核心范畴应当既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归宿,还是整个理论体系中一条以一贯之的主线。并且对核心范畴的认识应当是在大历史观下,通过对整个理论体系的深入了解与整体把握后得到的理性认识,它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下通过思维的碰撞而呈现出来。这种认识不一定是绝对真理,但却决定了一定时期术语革命与理论发展的走向,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就是人民,人民范畴不仅明确了整个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彰显了中国特色,它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标语或口号,而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内涵的核心范畴。

## 二、将人民作为核心范畴的理论依据

人民一经成为核心范畴,就意味着它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立场和价值取向,还应当内生地存在于全部理论的各个环节,并将各种局部理论连结为系统的理论整体,从而决定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与逻辑思维的发展进路。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探寻人民成为核心范畴的学理依据,以系统观念来回答人民何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人民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人民范畴的认识不仅要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中汲取营养,还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予以新的更为深刻的理解。首先,人民是在实践当中的人,而实践则包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经济实践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实践特别是劳动构成了实践的核心内容;其次,人民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非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第三,人民具体地代表每一个个体,也抽象地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或群体;第四,人民是具有一定需求的人,他们通过个人、集体、企业、社会团体、政府等具体组织形式来表达出特定的利益诉求;第五,人民内部普遍存在着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人民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第六,人民内在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划分,它的阶级构成由社会矛盾运动所决定;第七,人民包括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而不包括阻碍社会进步的敌人;第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2017);最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2021)。总之,人民范畴是个人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就数量而言,人民包含了人的绝大多数,就地位与作用而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国家的主体与主人。

事实上,将人民作为核心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的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人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贯穿全部理论的一条主线,因此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2018)。人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核心范畴地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许多经典著作当中有许多关于人的本质探讨的内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究其根本就在于人,没有了人社会也将不复存在,对人的认识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这就使人体现在了全部理论的各个角落。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逻辑起点是劳动,正是由劳动二重性学说才能够引出商品的二因素,而劳动又是人的本质。最后,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习近平,2018)马克思并不是在肯定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来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改变世界,并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归宿。

但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也是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并非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是应当维护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论述了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认为其“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马克思、恩格斯,1960),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社会力量,也是其思想转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因此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1958),即使得马克思语境下的人、人民具象化为无产阶级。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教条式地照搬照抄马克思的观

点,从而形成了人民范畴。可以说,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英国,由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人民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英国的人民。而在不同时期的中国,面对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的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将人民作为核心范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继承,也是基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 三、人民作为核心范畴的具体表现

可以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到处都有人民的影子,人民作为一种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既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性质、经济发展与经济运行的方向,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态。就其本质而言,人民范畴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具体来讲,人民范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起点,也是其最终归宿,更是贯穿其全部内容的一条主线。

人民作为核心范畴首先体现在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起点。以人民为科学起点又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1958),并且“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1958)。因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实践活动也一定是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活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一切从人民出发,使全部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都围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原有经济基础及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的核心任务都体现了人民的作用和人民的诉求。在改革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于本体论层面重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范畴,开始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民的活动,充分尊重劳动人民的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并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改革巩固阶段,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对增进人民福祉、人的全面发展乃至人类解放事业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用提高效率以弥补公平的方式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发展。在改革提高阶段,经济增速的放缓将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与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矛盾凸显出来。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继续将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在“新发展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构建起“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范畴体现在人民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主线。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经济制度的性质、经济运行的方式与经济运行的方向均服从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范畴贯穿了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生态经济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始终,这一点也可以从学理层面得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人民范畴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从抽象性来看,它代表一定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总体的、复数的人,并且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必然普遍存在着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恩格斯,1960)。就具体性而言,人民也可以代表部分的人或在一定社会历史当中的、在一定物质利益关系下的个别的、单数的人,他们有着相对独立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是从属于社会分工并处于特定社会地位上的人,因此每个个体也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既服务于人民抽象的共同利益、长期利益,也关心人民具体的特殊利益、短期利益,因此人民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的重要地位可以通过人民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来加以阐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取代了阶级斗争而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范畴体现在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归宿。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之际,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进一步规划,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2017)。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人类解放的目标虽然美好,但它的实现是有着一系列前提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这对于当代人类社会而言又明显过于苛刻。因此,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其中,解放、发展与保护生产力是手段,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是人类解放在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表现。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仅仅“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1993)。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我国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总体目标,使得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人类解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3页,第252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6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6页,第479页,第477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页。
- [5]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0月28日。
- [6] 习近平,202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7月2日。
- [7] 习近平,2018《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5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

谢地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①</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呈现为一个清晰可辨的知识谱系,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之滥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习近平,2020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

作者简介:谢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sup>①</sup> 《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光明日报》2022年4月26日。

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 20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充分运用其已经建立起来的宏大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特别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构想,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按照有利于劳动的原则进行分配等重要概念、范畴,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马克思经典作家语境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进一步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

二是历代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经济学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至关重要的积累。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党的领导人都有过杰出的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精神,毛泽东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特别是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邓小平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胡锦涛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 2021)。这些思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最终得以确立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必须直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最新拓展,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等。(中共中央 2021)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表达。

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经济实践活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得以孕育的“富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习近平 2020b)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马克思 200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不是本本主义的果实, 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经济实践活动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 许多新理论、新范畴都是对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进一步拓展也将更多来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以不断形成新概念、新理论、新话语, 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五是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内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镜鉴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 要注意借鉴。”(习近平 2020a)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是汲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必然要求, 也是在比较、借鉴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问题解释力和话语优势的客观需要。但鉴于西方经济学具有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晦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 充斥着西方的意识形态, 借鉴可以, 但不能奉为圭臬。

六是经济史学, 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厚重文化底色。

经济史是过去的经济实践。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们只能根据过去的经济实践总结、概括、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 进而不断延展其知识体系。从经济史的角度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中, 包括对新中国经济史,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丰富认知以及细节的把握, 也包括从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史中汲取的营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加入中国经济史底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好回答诸如当代中国经济的样貌为什么是这样, 而不是别样, 其与民族国家漫长历史演变之间不可磨灭的联结因素是什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清晰认知。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仍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中, 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比较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经济史中深刻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来龙去脉, 并据此预测资本主义未来的走势, 进而采取有的放矢的战略和策略。

七是经济思想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源流。

经济思想史是过去的经济理论, 是对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经济实践进行抽象、概括形成的经济学思想积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批判性继承的结果, 也是在与同时代形形色色的经济思想的论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视阈下: 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 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源流、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及其同时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轨迹的进一步梳理,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基础; 其次, 对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扬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不断创新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再次, 有待深入挖掘的中国古代以及近代经济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元素和文化底色。当然,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之间的“基因”关联, 我们还有大量的功课要做。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2019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第 16 期。
- [2] 习近平 2020a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 16 期。
- [3] 习近平 2020b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8 月 25 日。

[4] 马克思,2009《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5] 中共中央,2021a《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26页,第28-29页,第36-37页。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和发展途径研究

颜鹏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人类各种优秀思想资源,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sup>①</sup>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体系、结构、总体

黑格尔把“体系”或者“圆圈”视为表达真理“全面性”的最好形式,强调“真理只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黑格尔,1979)。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应该是一个由诸多圆圈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而没有体系的哲学思维绝不会是科学的东西。

马克思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他把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结构”、“总体”或者“整体”即“整个的内部联系”视为德国民族的功绩乃至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他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2009a)

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破除普鲁东关于体系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并且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先后推出了“五篇结构计划”“六册写作计划”,并且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撰写过程中改变初衷,推出《资本论》四卷结构。这三大结构计划的演变相辅相成,因为《资本论》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构筑了一个基础性体系即“小圆圈”;《资本论》“续篇”则是“六册计划”中的后五册,是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狭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整体。

应该强调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最早推出“有机整体”“总体”“经济学体系”“思想整体”“思想总体”“精神上的具体”“具体总体”“生产总体”等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以及“从属”型与“创造”型相结合的总体发展观,从而揭示了“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的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因此可与绽露“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1857-1858经济学手稿》“导言”推出的政治经济学提纲8条,也是马克思的理论之谜。例如,

---

作者简介:颜鹏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第1版。

如何揭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原生的生产关系与“第二级第三级、派生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发展”唯物主义史观与“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念的历史叙述”与“现实的历史叙述”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关于“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不平衡的发展”等,这是留待后人解决的理论难题。

恩格斯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其中包括“变形”观、“变形商品, die modifizierte ware”、“术语革命”的概念、定义和范畴,以及历史“总的合力”的思想,并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逻辑方法、认识论和世界观力图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哲学体系。任何概念、范畴和规律都具有“历史的痕迹”(马克思, 1975a)。<sup>①</sup>因此,不能把概念“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 1975b)。同时,任何概念、范畴和规律包含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出现的“社会形式”,以及存在于好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物质内容”。换言之,概念变形理论孕育重“术语革命”,从而导致体系的革命性变更和转化。

因此,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马克思观点和学说划时代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 1995)

## 二、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 1975a),是马克思对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这对于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一,这一界定体现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释生产关系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层次,“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阐释生产关系是什么;第三层次,“和它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则阐释生产关系的转化形式和实现形式问题。这体现了研究对象三大层次内在的统一性。

其二,必须区分与研究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与叙述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以及渗透其间的“问题导向”以及“逻辑导向”。

一是与研究方法以及与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第一道路”(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相联系的研究对象——“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 2009b)即生产方式亦即现实的劳动过程,其特征是与现实的劳动过程相关的“问题导向”。二是与叙述方法以及“第二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相联系的研究对象。这条道路,力求把抽象的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思想总体,从而赋予其逻辑体系形态,凸显其“逻辑导向”特征,最终体现两种对象、两种方法、两条道路和两种导向的对立统一。

学术界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一而足。主流观点之一是坚持把生产关系或者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视为研究对象,还有人倡导研究对象三维度——直接研究对象(商品)、心研究对象(资本)、最终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等等。

<sup>①</sup> “新发展”这一概念或话语在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大体上有数十次变形。其“历史的痕迹”大体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2年11月);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2012年12月);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2013年7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9月7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1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3年12月);统筹发展和安全(2015年5月);坚持新发展理念(2015年10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017年10月);推动高质量发展(2017年10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7年10月);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8年7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4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2020年11月);等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运动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派生形式和实现形式。如何结合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具体的实践,具体地深入地科学地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对象、两种方法、两条道路和两种导向内在的对立统一性,这是摆在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 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

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逻辑起点选择的整体性原则,亦即抽象性(抽象法及其抽象力)、现实性(唯物性)、始基性(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和历史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四性合一,以及抽象性服从现实性而置于首位的整体性五大原则。在马克思看来,选择起点都很难,这在所有科学中都如此。应该强调指出,起点范畴的始基性孕育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黑格尔,1977)。换言之,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现实性。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商品为逻辑起点,原因也是在于它所蕴含的关于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一切矛盾的胚芽。

应该强调指出,抽象性服从现实性而置于首位的抉择原则,也不容忽视,不可或缺。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仅仅具备抽象性而缺乏现实性。可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具备难能可贵的普遍的现实性。《资本论》最终定稿之前就多次重新起草了开头,最后放弃以“价值”而选择以“商品”为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众说纷纭,较为流行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基本经济制度起点论、自主的联合劳动起点论、国家起点论、经济运行(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起点论,以及把市场经济一般、人民主体、社会主义产品、社会化的劳动一般、企业、消费需求、“中国事实”(微观企业主体-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党的决策中心)作为逻辑起点,等等。

应该从具体的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这是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的唯物主义前提。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1975b)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经济学。这是构建体系,抉择逻辑起点、元范畴或始点范畴的唯物主义前提。

我们倡导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逻辑起点理论或元范畴。说到底,这一类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迄今为止,商品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形(实体性资本主义商品-虚拟经济品-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而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变形商品,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尤其在基于“两个毫不动摇”的双层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并存,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并存)制约条件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由此而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迁。<sup>①</sup> 随着社

<sup>①</sup> 《2017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4期)一文的作者颜鹏飞认为,变形商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元范畴,这是“2017年在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新进展之一。”另可详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蓬勃发展》,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3日。

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社会主义变形商品-公共品发展、演绎和变迁趋势中,越来越多的变形商品转化成为公共品。变形商品最终转变成为准公共品或公共品之日,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高质量发展之时。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第一,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具有二元性,即公有制经济体制及其国有企业(具有主体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及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并存。第二,社会主义变形商品市场所普遍存在的二元并存的混合机制:一种是以利润或者效率为中心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另一种是力图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调节规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并存,但是,却往往很难厘正两者的边界。第三,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形态,具有商品属性(例如外资企业是一种合作的劳资关系)和非商品属性的二元性质。第四,凸显按要素分配,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分配不公的临界点。第五,慎防另外一种愈演愈烈的商品-变形商品-公共品此消彼长倾向,就是反向演化走势。

#### 四、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

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内在动力是“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 2009b)并且衍生出来政治经济学提纲 8 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足以与凸显“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以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 条相媲美(马克思、恩格斯 2009c)。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如何发展?应该正确诠释和处理这一体系与“新发展理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原生态生产关系”与“派生的生产关系”、“党领导一切经济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

1.“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发展特征。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习近平 2021)。应该站在三大“新发展”这一战略制高点,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科学解答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

2.正确处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关系。应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切实把握这一矛盾的运行规律,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3.正确处理抽象“原生态生产关系”与“派生的生产关系”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形式、表现形式和转化形式,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毋庸置疑,培植、发现和论证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形态(如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4.正确处理“党领导一切经济工作”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关系。这是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篇大文章。

####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1979《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页。
- [2] 黑格尔,1977《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1-65页。
- [3] 马克思,1975a《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92页,第8页。
- [4] 马克思,1975b《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页,第892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1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页,第3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2009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6页。  
[8] 列宁,1995:《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85页。  
[9]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页,第22页。

## 回应时代需要的中国经济学发展

### ——阅读王亚南校长相关论述的体会

杨志勇

举办中国经济学学术讨论会特别有意义。经济学科是厦门大学的优势学科,王亚南校长为厦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亚南校长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努力,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学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回应时代的需要。

### 一、王亚南校长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

王亚南校长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至少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二是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三是构建中国经济学;四是推动厦大经济学教育的发展。王亚南和郭大力共同翻译《资本论》,这是汉语世界《资本论》的第一个全译本。《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汉译本的出版让更多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经典著作并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王亚南和郭大力为翻译《资本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先行翻译一些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王亚南在经济学学术翻译上的贡献远不止《资本论》一部,而是一系列作品。2021年厦大百年校庆,20卷本的《王亚南全集》陆续出版,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王亚南的贡献。王亚南的学术贡献远不止翻译,而且远不止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我们知道,王亚南还翻译了《欧洲经济史》等作品,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甚至涵盖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他对《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作深入研究,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等的研究,为他构建中国经济学做了准备。他结合中国实际,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影响力远不止经济学界。他所撰写的大量文章,迄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亚南校长对厦大经济学教育发展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贡献。厦大经济学教育在全国的地位,与王亚南主持厦大工作时留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高校调整时,王亚南将部分财经类专业教师留下来,这为20世纪70年代初厦大恢复经济学类专业招生起到重要作用。1987年国家教委全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评比,厦大财政学、会计学、计划统计学入选,含金量极高,财政学(含货币银行学)、计划统计学都是全国唯一的重点学科,会计学是全国两个重点学科之一(另一为上海财经大学)。今天,我们纪念王亚南校长,就是要把他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王亚南校长在中国经济学探索上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让我们有机会在高起点上发展中国

---

作者简介: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经济学。

## 二、王亚南校长对中国经济学的解释

在自然科学 我们不会说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中国生物学。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 遗传学曾经有资产阶级遗传学和无产阶级遗传学的争论 但最终科学和真理的天平回到正常的地方。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在具体应用中各国会有很大差别 而且在科学探索中 由于对规律认识的不同 或处于不同的认识阶段 社会科学或表现出国别或区域的差异性。最终 社会运行会服从规律。我们相信 最终会得到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

王亚南校长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时 就注意到可能的争论。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 他对中国经济学所作的解释是“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 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 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其例解、其引证 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 作为材料。”(王亚南 2014)他当时的评论是:像这样一个题材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 到目下为止 我们尚不曾发现。他撰写《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对此所作出的努力。这一任务尚未完成 即使是80年后的今天 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经济思想 经济地位在世界上也长期领先 但并没有产生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的发展有其社会背景 并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经济学的诞生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没有市场经济 就没有经济学。严复翻译《原富》(即《国富论》) 不仅翻译 而且加了许多按语。按现在的眼光来看 严复的理解不无疏漏 但《原富》确实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晚清时期 各类经济学教科书虽不断翻译过来 但多为节本;经济学基础知识也引进一些 但仍欠系统。随着大批留学生到日本 到欧美 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教育 并参与到经济学的发展当中 其中的不少人回国之后又照搬照抄 食洋不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学确实有发展的必要。

下面就王亚南校长对中国经济学的阐释谈些体会。中国经济学是“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 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王亚南 2014) 经济理论教程(经济理论教材或经济学教科书) 如果不利于中国人阅读 就不会影响中国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谁会去看这样的舶来品。经济理论教程不只是理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经济学在中国 常被称为“经世济民”之学 经济学应该能够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指路 这样的经济学才真正管用。从这点来看 王亚南心目中的中国经济学 是接中国地气的经济学 是中国人有兴趣阅读的经济学 是能够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经济学。王亚南关于“经济理论教程”的解释 也说明这里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指的是中国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经济理论教科书。理论教程不同于具体行动指南。

王亚南校长指出,“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 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王亚南 2014)。经济学有共性 需要一般理论体系 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更需要考虑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言易行难。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 哪些适合的是一般情况 哪些适合特殊情况。适合中国的也不见得就是特殊情况 这样的理论也可能适合一般情形。这些都需要辨别。

王亚南校长指出,“其例解、其引证 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 作为材料”(王亚南 2014)。中国本来没有经济学 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 更不等于不能从中提炼出新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创新的一条路径是对既有的理论进行纯理论研究 这样的创新多是对理

论自身的不足而进行的。理论从现实中来,现实不变,但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未来可更好地用于指导实践。理论来自现实,现实变了,理论也可以随之变化。经济理论在解释各国经济现实上有共通之处,这是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理论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各国经济现实表现不同,甚至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都不一样,一国关心的经济问题,另一国可能不太关心。基于一国经济现实所发展的经济理论,不见得能很好地解释另一国的经济现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共通的经济理论,可以同时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对这样的经济理论,不仅可以用外国事例来理解,而且也可以用中国事例来理解。引证同样如此。对这样的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实况,显然有助于中国人理解经济学。这么做不是简单的“既有经济理论+中国案例”。如果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经济理论在中国就不会得到发展。如果中国经济现实不能通过既有的经济理论得到解释,或者既有的经济理论不能满足经济现实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国就必须发展相应的经济理论。理论与例证、引证的结合,可以发现新问题,为理论发展找到新路。

王亚南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就谈到的中国经济学问题,如今也不同程度存在。就拿中国经济学教材的编写来说,不少人习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现代经济理论+中国案例”的方法来编写经济学教材,这是远远不够的。丰富的中国经济实践已非既有的西方经济理论所能解释。新的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编写,应该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实践新成就。教材是成熟理论的提炼,经济学教材也不例外。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最难的是经济理论储备不足,但这不能成为不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的理由。合理的做法是在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的同时,尽可能补上经济理论的短板。克服困难,需要中国经济学界艰辛的努力。

### 三、回应时代需要,发展中国经济学

王亚南校长所指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迄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回应时代需要,发展中国经济学。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事业发扬光大,构建起有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来自实践,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亟待有好的经济理论予以解释。这不仅是在讲好中国经济故事,更是在发展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的生命力来自实践,只有对实践问题作出有力回应的理论,才能做到理论之树常青。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经济学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认识世界,不断地改造世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经济学能做什么呢?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过程。任何社会,只要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经济学的发展是不断总结经济规律的过程,通过总结经济规律,让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规律在不断地发挥作用,但又不会自动呈现出来,规律需要靠我们去总结。

王亚南校长对经济学发展史有深入的研究。经济学是实践的科学,最初是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王亚南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向上发展的阶段,二是向下发展的阶段;经济学本来是实践的科学,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向下发展时,经济学的实践性反而不明朗;本来需要突出实践性的经济学,反而更加强调演绎的抽象的研究,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王亚南,1987)。王亚南指出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如何形成各自的经济理论,对英国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性。经济学在英国和德国的不同遭遇,说明经济学的实践性,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经济学发展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求知原不难,难在明变”,变体现的是规律,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就是在探索变,探索中国经济规律。

王亚南校长非常注意比较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的必要和可能,就是从比较中提出来的(王亚南,1987)。发展中国经济学,应该放眼世界,立足国情,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学的发展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遇到现实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认清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国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提出解决方案,这是比较研究的魅力之所在。用好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而不是故意去走弯路,至关重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因此有了经济奇迹。进入新时代,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各种不确定性更多,但只要 we 坚持积极回应时代命题,不仅问题会得到解决,而且中国经济学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并不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要求“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2016)。这是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要求。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按照这一方向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一直摆在那里,前辈学者为此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合为时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曲折探索,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经历了不同的认识过程。摸着石头过河,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如何有机协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践推动和理论认识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些都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现实背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命题,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充分回答时代之问。

中国经济学人已经更加重视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但与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取得一定进展,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进步,但与目标要求仍有不小差距。发展中国经济学,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更不是要堆砌起一套华而不实的体系。发展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要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直面时代命题,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时代使命。

当今世界,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中国不断优化经济政策,不断地推进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的有机结合,有不少经验可以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学人更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些经验总结为经济规律,并上升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又可以用于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实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是开放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为一般经济学的发展在作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那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中国经济学,就是通用的一般经济学。

#### 参考文献:

- [1] 王亚南,1987《王亚南文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96-125页,第126-137页,第74-95页。
- [2] 王亚南,2014《中国经济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16-417页。
- [3]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实践中的传承与创新

### ——王亚南先生治学精神引发的思考

张晖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学人聚焦于“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sup>①</sup>、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建设;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传承中国经济学先辈所秉持的“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扣百年实践进程,总结经验、提炼概念范畴、刷新政治经济学既有范畴的理论内涵,“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 2016)。

### 一、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界不能忘怀的前辈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工作,书写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传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不能忘怀王亚南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几条理由:

其一,倾注毕生心力,执着追求真理。浏览王亚南先生的生平和了解他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会产生令读者肃然起敬和感叹折服的情感。自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中国,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说的翻译推介和回答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方面,王亚南和郭大力两位先生所做的工作特别突出,以至于说当代中国经济学人不能忘怀他们的杰出贡献。王亚南先生心系国家民族发展,辗转漂泊、来回回旋、用心求索,熟读经典,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倾注心力。早在 1938 年就与郭大力先生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经典著作《资本论》,成为中国先进青年队伍求索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可以说,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完整的翻译出版,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严密性、整体性和科学性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王亚南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成果,对我们今天的研

---

作者简介:张晖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据新华网 2015 年 11 月 24 日报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 11 月 23 日下午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第 28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3/c\\_1117234411.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3/c_1117234411.htm)。

究工作富有启示。这就是:对于《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习应用,特别需要强调将之放在国家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放在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的动态发展的总过程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整体性”理解,才能够增强提高回应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面临问题的能力。

其二,厚积薄发,积跬步以致千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资本论》三大卷译本是在王亚南先生和郭大力先生翻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多位古典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之后。前期的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为过渡到全译《资本论》奠定了直接的学术基础”(李月华,2021),也反映出两位先生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脉络有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才着手《资本论》翻译工作的。可见,对于马克思《资本论》所建构的实证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认同,才能够准确把握住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精髓,保证将《资本论》这一鸿篇巨著所建构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充分清晰地转换为中文语言表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读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创造了便捷的条件。王郭两位先生在学术翻译工作方面的工作态度和方式,正是我们当代经济学人必须认真学习和继承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可贵的学术情怀、治学态度和理论素养。

其三,基于以上特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社会特质进行剖析和独特的概括。王亚南先生运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认为“经济学作为一种真正的科学是在制造业时代最初出现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是从流通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的理论考察才开始的”(叶世昌等,2017)。这一论述强调了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活动对于政治经济学学科特质和学科使命的特别重要意义,实际上也就揭示出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发展的生命力来源。在回答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和运行规则问题时,他特别强调“研究中国经济所依据的科学”:一是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批评性经济学;二是经济史学;三是中国经济史。他强调“经济学必须与经济史学结合起来研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生活中旧的传统经济成分逐渐为资本制度的经济成分所侵蚀,同时前者又一直限制、抗拒或适应后者。我们必须在他们这样互相制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去看他的特质和动态。”(叶世昌等,2017)正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入洞察和研究积累,王亚南先生最终得出了“中国社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发展样态”的深刻见解(叶世昌等,2017),撰写了《中国经济原论》这一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经典著作,建构起完整系统的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和运行特征规律的分析逻辑,解构了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指明这个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质。这样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活用”和“发展”。

其四,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拓展关系有清晰界定。正是有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独特见解和理论分析体系,王亚南先生不仅强调了“要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还主张建立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即“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经济社会,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王亚南,1943),甚至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承认经济学一般原理基础具有“一般妥当性和系统性”,但是回到应用场合,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的。他“在这个前提认识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王亚南,1943)。这样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具有鲜活的参考价值。

## 二、王亚南经济学思想研究方法特点与启示

我们强调在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实践中,需要学习继承中国经济学前辈的优良学风,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吸取养分,去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

研究工作。努力传承以王亚南先生为代表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命是实践的、问题导向的。王亚南先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主张经济学是“实践的科学”,就是要倡导“以问题为导向”,强调以“批判的观点”去研究社会现实,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学原论》就是典范,被誉为中国的《资本论》,在当时的学术界就被认为具有“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他所建构的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研究理论体系,被国外经济学家所重视。由此表现出既回答“一般妥当性和系统性”经济原理,又能够更加深刻地展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个性”的东西,因而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和吸收。

联系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工作,如何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推进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的丰富实践,并在阐述社会化大生产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独特因素、个性特征,概括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色内容,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而王亚南先生所提倡和践行的“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性的主张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其次,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的“实践的”、其研究成果具有令读者“置身其中”的特点。王亚南先生认为,经济学既然是实践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其成果表现就要在实践的意义上去正确理解。这样的对于经济学特质和使命的见解,充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格和研究取向。王亚南先生在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涯中,总是秉持着家国情怀,将学术翻译和教学研究工作与国家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思考着我们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他辗转日本、西欧流亡游学期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方式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体系。也正因为上述经历,增强了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具有的实践性的深刻理解,感悟到学术成果的实践性、确立起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格和发现并解决问题的研究取向。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风格特点的理解,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就是揭示(解释)“诸事象在特定情形下所显现出的相互因果关联”的“经济法则”——“把个别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法则发现出来,就是经济学的任务”。(王亚南,1943)并且这样的经济法则具有规律性、系统性和实在性,也体现了“问题导向”展开研究的方法。因此他特别强调经济学要与经济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以增强实证性,形成“令读者置身其中”的阅读感受。

再次,政治经济学具有深刻“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解释问题”“指导解决问题能力”。王亚南先生以自身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厚学养,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使命,他所著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为对照,论证了中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性。这也是他全面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建构对经济生活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进行分析的经济范畴逻辑体系,在实证方面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说服力的深刻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灵活运用这一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就能够做到经济理论体系阐述上有刷新再造能力,得出让国内外经济学家所重视和接受的学术传播力。《中国经济原论》多次再版并被日、俄、英等多种文字翻译出版就是明证。这也验证了王亚南先生所主张的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本意,即在遵循经济学一般原理基础上,还具有回答好如何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学术使命。运用实践、应用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学,王亚南先生还提出了“经济学的两个历史使命:作为民族生存斗争的理论武器、作为社会生存斗争的理论武器”(叶世昌等,2017)等主张。这也充分体现王亚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学科方法论和学理体系的应用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性”与实践应用的“规范性”之间关系有完整的认识。

以上分析启发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形成客观科学的评价,并

提出建设目标要求:一方面,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的”“进程的”一般规律、具有国际交流对话的理论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深入总结既有实践成果和经验,对蕴含其中的经济发展规律有自觉认识和理解,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持续前行、行稳致远。

### 三、方法论创新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方法论是理论学术创新的“钥匙”。马克思正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形成解剖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强大的学术阐释力。王亚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展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积累,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形态所做的“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分析体系的建构,正是缘于他所秉持的“实事求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起学习继承的标杆,启发我们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究工作。接续继承前辈的研究风格,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工作内容,笔者就以下四个方面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求教于学界同行。

1.关于理论体系建构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需要找准理论体系展开的“主线”,也就是廓清或凝练贯穿体系中的理论逻辑。同时,这一理论体系应当具有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具有反映经济增长一般规律、又充分显示中国经济发展个性特点的学术表现能力。进一步说,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无疑需要在最基础性的研究方法上下功夫,需要在经济哲学研究视角上花气力。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基点上,需要我们对作为这一分析方法基本范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内容进行全面刷新,对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数字化、金融工具化等多重因素渗透作用于这两个基本范畴相应引致两者之间作用方式的变化有全新的理解,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升经济哲学意义上分析问题的“工具”能力,去解剖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展开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

2.关于理论体系的叙述的起点和叙述方式。如何将理论的主线叙述展开,也就是理论逻辑能力的具体表现,需要找准逻辑展开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通过处理“研究的方法”与“叙述的方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找准了“商品”这一蕴含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经济主体相互关系的基本范畴作为起点,表现出强大的理论逻辑表现能力。而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范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分析的逻辑起点,学术界依然存在不同的主张<sup>①</sup>。这一方面反映出学术活跃和繁荣争鸣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经济哲学方法论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体系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3.关于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内容。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任务,就是要刻画经济运行中的主体行为诉求和分工合作竞争关系及其经济发展的动态效率,揭示蕴含其中的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因此需要对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界定和指向。围绕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涉及如何揭示经济运行中的各类主体的本体性、主体行为的内生性和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客观性,以显示经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实证性”的学术特点。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处在和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如何通过充分认识和理解“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内容,兼顾“本体性”和“客观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理解释能力和对于实践前行的指导能力,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4.关于理论成果表现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并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沿着新的“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有条不紊地继续向前推进着。中国特

<sup>①</sup>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点,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主张:包括“劳动”范畴、“变形商品”范畴、“公有制”范畴等,基于不同起点主张建构逻辑结构体系。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就是对这样的实践演进所蕴含的客观规律加以总结,形成学术的、学理意义上的话语表达,反映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和验证,不断丰富、刷新、升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经济理论与案例汇聚贡献出中国智慧。正是这样,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工作实践,需要重视在成果表现方式上,处理好学术的、学理的话语形式、即概念范畴体系与宣传传播话语形式(政策语言)之间的互相交叉和不同功用关系。兼顾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强国际交流对话,提高理论学术的国际影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这样,需要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从丰富多样的成功实践挖掘经济理论元素,凝练生成新的概念范畴,刷新既有概念范畴内涵,不断丰富和积累以概念范畴为载体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话语能力。

#### 参考文献:

- [1] 李月华,2021《郭大力、王亚南与〈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百年潮》第7期。
- [2] 王亚南,1943《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科学论丛》,上海:中华正气出版社,第173页,第177页,第4页。
- [3] 叶世昌等,2017《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127页,第132-133页,第129页。
- [4]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

周文

本文的主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第二部分是讲王亚南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第三部分是讲中国经济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重要内涵

#### (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提出

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sup>①</sup>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并指出这一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同时强调以“七个坚持”为核心要义。2021年11月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两个确立”,并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推动新时

---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sup>①</su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第1版。

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实体机构,是党中央深入学习、系统研究、更好地宣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项重大举措。2021年7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召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随后《经济日报》专门开辟习近平经济思想论坛征文,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

## (二)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概括为十个“明确”,这是在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作出的新概括和阐释,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前经济学理论界已从多方面进行了概括。

现在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更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所蕴含的系统化经济学说,彰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涌现出的具有标识性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从经济学研究角度来看,就是要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的系统化、规律化的逻辑和经济学学说,这是时代赋予经济学者们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所强调的,“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sup>①</sup>

## (三)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创立者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全党全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人民性、政治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的鲜明理论品格(何毅亭,2021)及其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作出原创性理论贡献。

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2016)。概括来说,体现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范畴”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构成习近平经济理论体系创新的核心要素,具有“术语革命”的重要意义,也极大丰富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只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是指坚持理论创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逻辑是明确坚持问题导向,既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胸怀天下。

## 二、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与中国经济学

最近重读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这是一本不朽的传世名作。尽管《中国经济原论》中的文章

<sup>①</sup>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5月11日第1版。

是70年前发表的,但其中很多观点今天仍然不过时,仍然闪烁着老一辈经济学者的智慧,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指导思想。因此,应当重视研究、挖掘和提炼王亚南的学术思想,这也是厦门大学未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要重整旗鼓再出发,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旗帜,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生力军。

### (一) 中国经济研究的任务与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当时中国大学讲坛上主流经济学都是“舶来品”,而中国学者对经济学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很少结合国情联系实际提出新的经济理论。王亚南强调: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注意,我会提出“中国经济学”的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王亚南,2014)

而且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有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王亚南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学者的视野,他认为:正如同我们的经济,受着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束缚,仍必须拼命挣扎,以求解放一样,我们的外铄不由自主的经济意识,亦当由我们努力,由我们展开研究的视野,俾能配合并进一步指导我们的经济解放;只要我们的经济学者,肯从他们一向被拘囚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象牙之塔”中开脱出来,中国经济学界定然会一新其面目(王亚南,2014)。

### (二) 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

王亚南并非对外国经济思想绝对排斥,而是主张兼收并蓄、兼容并包。针对当时国内比较多流行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问题,他说,我绝对尊重学术自由研究精神。奥地利经济学学派至少可以跟古典学派、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派的经济学一样,值得我们研究和批判(王亚南,2014)。但是,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不是永恒的,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时代背景,不能食洋不化。唯其如此,我们需要明了,这种经济学是适应资本主义衰落期的现实要求而产生的。在经济学史上,它并不像它的一般信奉者所誉称的经济学的复兴或再造。即使再强调它的重要性,亦不能把它当作经济学的全体(王亚南,2014)。

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王亚南主张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照抄照搬。他说“自己不能制造商品,对于舶来商品不易辨认其真伪。自己无从创建经济学,对于舶来经济学亦不易判别是非。因此,现在我来批判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的作风,实在是哀悯的心情多,而指责的意思少。”(王亚南,2014)

### (三) 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王亚南认为,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要立足和注重对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的研究(王亚南,2014)。他针对当时大学里经济学学科和体系中,言必称希腊而数典忘祖,千篇一律地以“四分主义”为蓝本的陈旧体系提出尖锐批评。

第一,中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大体对这门学科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形而下学,抱着发财致富的企图研究经济学;另一种是形而上学,为学问而学问,政治经济学超然化。对此,他提出会造成“三个无关”:一是与现实无关的学问,抽象的演绎的科学;二是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三是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无关的学问。

第二,“四分主义”说的检讨。自1821年詹姆士·穆勒的《经济学要义》将全书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章,经济学上产生了“四分主义”。但是“四分主义”说有两个错误:一是理论体系的支离。一个有组织的理论体系,应当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统一全部脉络的中心枢纽。等于“四头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这个中心枢纽告诉我们。二是说明程序的凌乱。

第三,三位一体说,即“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王亚南认为这种体裁、这种性质的经济学,造成了“三个无关”(王亚南,2014)。

为此,王亚南提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再三强调,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认清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面目(王亚南,2014)。

### 三、中国经济学建设问题

#### (一) 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与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习近平,2016)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与范畴,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独特优势,进行深入挖掘并汲取融通。

第一,现代化概念。什么是现代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概念的主要内容是指服务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达到70%以上,但现在看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国家繁荣离不开制造业。国家繁荣富强需要强大、多样和富于创新的制造业,其目标不仅是提高质量产品,还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此,现代经济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是一个误区。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后工业社会、自由贸易、进口工业产品或者产品外包,结果导致经济体虚化和弱化。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概念。以往教科书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主要是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企业制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把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化地等同为股份制,企图实现“一股就灵”。然而,当前股份制改革不尽如人意,中国企业并没有因股份制而成为现代企业,反而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混乱,加速了资本无序扩张现象。所以股份制不等于现代企业制度。因此,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待学界进一步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一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个字界定,已经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实际情况,也需要重新认识和梳理。

第三,产权概念。产权理论是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按照科斯理论,当交易成本为零,无需产权界定,市场成为完全竞争市场;而在真实世界里,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产权界定就尤为重要。因此,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中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公有制产权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而是一个模糊产权的概念,并认为产权清晰归根结底就是回到私有化。经济学理论的不彻底、不系统性,容易导致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这些概念都需要真正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

第四,“交易成本”概念。按照交易成本学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团队生产会产生搭便车问题、集体生产的低效率问题等,因此强调个体的理性、自由放任和私有化,不主张团队生产。与西方不同,中国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这就是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前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已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制度优越性,由此更加清楚地表明西方理论存在的问题。因此,系统化、学理化地阐释这一成功经验,提炼和重塑这些经济学概念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现代财政制度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理论主要是缘于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财政学也被称为公共经济学。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存在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然而,新中国财政七十多年发展的历史逻辑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吕炜、靳继东,2021)。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全新定位(习近平,2014),第一次把财政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摆正了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位置。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财政理论应该摆脱西方公共经济学的话语束缚,要考

虑政府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二) 不断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

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不完善、分类不科学等问题依然存在。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中,二级学科设置碎片化、泛化,无法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学术性和学理性也有待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只是成为高唱凯歌的主旋律,必须回到三大组成部分。首先,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有些时候将一些没法成体系的东西全部装进去,这不是壮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反而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导致“不精、不专”的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二级学科的设置不够科学,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事实上是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学科。再次,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二级学科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完整学科体系,缺乏系统性知识,很难培养出真正有理论水平的人才。为此,要重视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系统化构建。

## (三) 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化问题

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必然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引起世界关注,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主战场。因此,中国经济学不仅面临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本土化问题,也面临着中国经济学研究任务的国际化问题。

然而,现代西方所谓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改变,只是在旧的理论范式下做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框架调整,不但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反而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理论依据。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实是美国经济学的翻版,是服务于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理论体系。因此,按照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实现赶超主要充分利用了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这就必然成为西方肆意揣测中国政府补贴和强制技术转移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化问题中,判断和评价经济学研究学术成果不能“唯 SSCI 论”,不能简单地“以刊评文”。事实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的 SSCI 量化影响因子评价标准不过是由西方私人机构研制并被资本卖来卖去的赚钱工具而已,它使得学术评价的功能逐渐被异化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是内嵌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并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单纯依靠 SSCI 评价体系不但无助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现象,推崇“SSCI 至上”反而会使得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下无法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持续发展,甚至会扼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人才成长的机制。

### 参考文献:

- [1] 何毅亭 20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经济日报》3月16日。
- [2] 习近平 2016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 [3] 王亚南 2014 《中国经济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3页,第442页,第441页,第441页,第442页,第400-409页,第441页。
- [4] 吕炜、靳继东 2021 《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管理世界》第5期。
- [5] 习近平 20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第80页。

(责任编辑:张兴祥)